



战略与安全

SECURITY & STRATEGY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1 年 4 月 2 日)

1、《外交事务》：民主复兴如何重振国际体系

3 月 30 日，《外交事务》网站刊登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任、首席执行官罗宾·尼布莱特（Robin Niblett）与该研究所美国和美洲项目主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国际关系副教授莱斯莉·文加姆力（Leslie Vinjamuri）共同撰写的文章《自由秩序由内而生：民主复兴如何重振国际体系》。作者勾勒了自由国际秩序面临的诸种危机，强调民主国家内部的经济不平等与政治自由受阻是冲击自由国际秩序的重要因素，认为自由国际秩序的振兴应从重建国内民主开始。在民主国家内部，作者将危机诊断为全球化转变的代价、移民带来的政治社会冲击与因疫情加剧的经济衰退与不平等。就此，作者提议在民主国家内部推行可获得跨党派支持的公共政策，包括财政政策以振兴国内市场、基础设施公共投资以增加就业、金融机制以在全球化中自我保护、税制改革改善国内不平等，并在这一过程中注意平衡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同时，美欧在移民问题上应平衡移民带来的经济利益与其对社会文化安全的挑战，制定开放包容的移民政策，将国家认同从民族、种族或宗教认同转向对自由民主价值的信仰。在国际层面，

作者指出战后多边机制面临挑战、跨大西洋关系受损及全球化进程下中国和俄罗斯崛起的多重危机。作者提议美国与盟友紧密合作，修复跨大西洋关系，与第三世界民主国家密切接触，在多边组织中谋求应对全球性危机；扩大民主联盟的同时制定更为精细的民主联盟成员标准；在与非民主国家的协调中平衡主权与有效合作。同时，作者认为民主国家需要协调一致应对中国，但各国对中国不同层面的依赖加大使这一构想难以实现。作者建议在抵制中国监控设备出口、技术合作、新的基础设施融资项目方面开展合作。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21-03-30/liberal-order-begins-home>

撰稿人：任怡静

2、《外交政策》发文分析美中国际秩序之争

3月31日，《外交政策》发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的文章《中国也想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文章指出，将美中分歧聚焦于是否认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是有误导性的。美国有时也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来修改或逃避某些规则；中国接受并捍卫了现存国际秩序中的许多规则，未来也将致力于保留这一秩序中有利于自身的部分；此外，放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不意味着国家行为将不再受到任何规则制约，新的国际秩序还将对国际互动加以管理。作者强调，美中竞争的核

心在于以哪一方的偏好塑造国际秩序。美国更偏好一个符合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关注个人权利的多边体系，而中国则更倾向于强调主权至高无上和不干涉主义的威斯特伐利亚式秩序观。各方应当意识到，美中间的任何一国都不能制定所有规则，但伴随中国的崛起，其塑造规则的能力持续提高，世界各国将面临比单极世界更多的选择。尽管对比因中国强势行为导致的各国对其怀疑，美国处两洋之间的地理位置与其更为利他的霸权可能更有吸引力，但各国仍对美国霸权对世界的剥削（尤其在金融层面）表示不满。作者认为，短期内拜登的积极外交政策可能使美国重塑全球领导力，但长期的规则之争仍基于美中两国硬实力的对比。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3/31/china-wants-a-rules-based-international-order-too/>

撰稿人：许卓凡

3、《国会山报》发文分析拜登政府的外交失败

3月31日，《国会山报》发布天主教大学政治家才能研究中心主任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的文章《为何说外交尚未回归？》。文章指出，拜登政府声称美国将重新采取外交手段以加强同世界的接触，并修复其与盟友的关系。然而，几个月来美国的对外行为却反映了其外交的失败乃至缺席。在美加关系上，拜登撤销了美加输油管道（Keystone）许可证，导致两国大量工人失业；在美德关系上，拜登团队不断批评德国对“北溪”管道（Nord Stream）的支持，使两

国关系破裂的风险上升；在伊朗问题上，美军轰炸了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选择以军事行动向德黑兰“传递信息”；在美俄关系上，拜登多次发出对俄不友好的言论，导致俄方撤回其驻美大使；在中美关系上，拜登团队以严厉的批评作为阿拉斯加对话的开场白，却并未努力与中方寻求共识。对此，文章认为，美国外交失败的根源在于精英的道德优越感，这种傲慢的态度使他们无法理解他国的利益和立场，并总是倾向于威吓他国以实现自身目的。美国精英应学会以谦逊的态度理解他国，并对自身行为的正确与否加以审视。

<https://thehill.com/opinion/international/545775-why-diplomacy-has-not-returned?rl=1>

撰稿人：许卓凡

4、《外交事务》：美国是沙特萨勒曼王子权力的最后制衡

3月30日，《外交事务》网站刊登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布什政府与公共服务学院国际事务教授F·格雷戈里·高斯（F. Gregory Gause III）的文章《美国是沙特萨勒曼王子权力的最后制衡：华盛顿应控制而非孤立沙特王子》。文章分析了近年来沙特国内权力结构的变革及其国际环境，认为美国是少数有能力制衡萨勒曼王子的因素，就此反对美国国内要求孤立萨勒曼王子的声音。文章指出，萨勒曼王子是沙特国内决策机制的重要支柱，2015年萨勒曼国王掌握政权以来对沙特国内权力决策机制进行改革，萨勒曼王子实质上成为沙特权力第一人，成为唯一有能力推动国内改革的人物，目前没有迹

象表明沙特皇室或国内有任何反对力量能与之抗衡。作者强调，美国是沙特最为重要的经贸伙伴和最终安全保障者。但挑战萨勒曼王子无异于推动沙特政权更迭，这对美国来说并不现实，因此拜登政府更需要清晰地向萨勒曼王子传递信号——哪些行为美国是可以接受的、哪些行为不可容忍。作者建议拜登政府向沙特派遣一名资深大使，推进双方在也门内战、打压国外沙特不同政见者、巩固伊拉克政府、与美国进行危机协商等问题上进行合作，将有助于控制中东地区危机蔓延、避免新的冲突。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middle-east/2021-03-30/united-states-last-check-mbss-power>

撰稿人：任怡静

5、《经济学人》：全球供应链仍将是经济优势的来源

3月31日，《经济学人》发表题为《全球供应链所带来的仍是经济优势而非劣势》的文章。文章指出，随着地缘政治局势日趋紧张，各国政府的政策从追求经济效率转向提升经济自主性与韧性。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供应链会成为经济脆弱性的来源。在全球化的供应链中，生产被集中在特定某几个国家，且各国缓冲库存较少，这使得国家间彼此依赖。因而，在地缘政治对抗性加剧时，各国开始警惕于此依赖性。印度莫迪政府“为当地发声”的口号；拜登政府对美国供应链的安全审查；欧盟在芯片领域的全球份额提升至20%及其在2025年实现电池自给自足的计划；中国的“双循环”都是

政府对全球供应链进行干预的表现。然而，此种干涉已超过了政府应有的干预限度。作者认为，“自给自足”的计划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国内供应链的弹性远小于全球供应链。后者在疫情期间很快适应变化并为世界带去了海量口罩、食品和疫苗。同时，自给自足的经济也会增加生产的成本和对消费者的隐形税。自力更生并不能增强经济的风险抵御能力。经济的风险抵抗力来源于供应源的多样化和私营部门的适应力。文章呼吁，持续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不应在此时搁浅。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21/03/31/global-supply-chains-are-still-a-source-of-strength-not-weakness>

撰稿人：张昭璞

6、CSIS：美俄在北极的关系——在气候问题上的改变

3月31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其负责欧亚大陆和北极项目的高级副主管希瑟·康利（Heather A. Conley）及该计划研究助理科林·威尔（Colin Wall）撰写的文章《美俄北极关系：在气候问题上的改变？》。文章称，随着俄美完成《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续签，双边参与气候变化治理合作已成当务之急。然而双方的合作面临重重困难。俄罗斯气候政策言行不一，在战略制定上颇为重视减排和可持续发展，但实际上致力于开发北极航道，开采北极天然气和石油。其能源计划并不能够减少化石燃料的生产、燃烧和出口。美国也因在环境保护和北极经济发展之间犹豫不决而存在着政策矛盾，且美国缺乏足够的预算以增强

它在北极地区的实际存在。文章建议，在美俄关系危机不断的状态下，拜登政府应确定以下两个气候项目以突破上述难关，获得俄合作支持：加强对永冻土的观察研究，并支持北冰洋中部的渔业管理。一方面，永冻土一旦融化，将会对全球生态系统造成巨大影响。拜登政府可通过资金支持，发展俄罗斯也同样感兴趣的遥感观察项目，以鼓励关于永久冻土融化的研究。另一方面，冰岛、欧盟、中国、日本与韩国在2018年签署《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除了欧盟外，其余签署国都是北极理事会的成员或常任观察员。美国可以在俄罗斯担任主席期间，通过该理事会促进北冰洋中部关于渔业的联合科学研究计划，从而加强美俄之间的合作意识。作者认为，当下正是美俄进行合作以便能于以上两个领域取得成功的时机。尽管这些举措并不会令举世瞩目，但将加强整个北极地区所急需的合作。

<https://www.csis.org/analysis/us-russian-arctic-relations-change-climate>

撰稿人：张昭璞

7、《外交政策》：俄罗斯和中国寻求在空间问题上束缚美国手脚

3月31日，《外交政策》杂志发表了保卫民主基金会军事和政治权力中心的高级主任及参议院军事和外交关系委员会前顾问布拉德利·鲍曼（Bradley Bowman）与美国空军少校，也是国防或民主基金会的访问军事分析师贾里德·汤

普森(Jared Thompson)撰写的题为《俄罗斯和中国寻求在空间问题上束缚美国手脚》一文。作者分析了中俄在太空军备方面的动向，认为美国不应卷入中俄无意遵守的太空军控国际条约中。作者强调，当前中美俄太空领域的军备竞争激烈，中国与俄罗斯均已在快速发展和部署以卫星为目标的陆基和天基武器，包括中国已测试的“清道夫”卫星及俄罗斯部署的“套娃”卫星和其他地基激光武器。分析中俄两国推动的“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PPWT），作者指出其并未明确禁止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制造的陆基反卫星武器，也并未阻止以民用或商业能力为幌子部署天基武器，因此作者认为该协议将使中俄能够以评估、维修损坏的卫星状况为由将表面上和平或商业的卫星输入轨道来禁用或摧毁美国的军事和情报卫星。最后作者建议美国与盟国积极合作提升太空军事弹性和情报获取能力，不落入中俄条约的陷阱，同时也应推动制定太空竞争的规则。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3/31/russia-china-space-war-treaty-demilitarization-satellites/>

撰稿人：王欣然

8、美国企业研究所发文评析美伊重回核协议的可能性

3月30日，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发布“紧迫威胁”项目主任弗雷德里克·卡根（Frederick W. Kagan）撰写的文章《美伊可能在今年内重回核协议》。作者指出，虽然双方在解除

制裁和伊朗履约的先后次序上意见不一，但都未拒绝分阶段恢复协议的计划。此外，拜登政府业已进行小幅让步，收回特朗普作出的美国已激活《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中立即恢复（snapback）安理会所有制裁条款的声明。分阶段恢复履约无需正式谈判、签订新的协议或公开宣示，有利于双方应对国内政治压力。伊朗央行 2 月 25 日称，促使伊朗国际金融透明度合规的法案有望获批生效。由于中俄等潜在的伊朗投资伙伴并不在意金融透明度问题，这一法案意在为伊朗未来吸引西方投资、享受制裁解除后的全部利好扫清障碍。该法案已获议会批准，但在政府强硬派影响下一度搁置良久，最终审批权掌握在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手中。法案有望获批的迹象表明哈梅内伊期望伊朗重返 JCPOA。另外，虽然双方开始恢复履约的具体时间点不确定，但由于出身革命卫队的反 JCPOA 候选人可能在今年 7 月大选中上台，伊朗迫切希望美国在此之前解除制裁。不过，双方仍无法就伊朗导弹项目和停止伊朗在周边地区活动展开谈判，因为导弹项目对伊朗的安全至关重要，伊朗会借此漫天要价（涉及要求美国撤销所有制裁和从中东撤军）；且一旦美国宣布逐步解除制裁，伊朗进行谈判的后续动力将大幅减弱。最后，作者在附录中分析了哈梅内伊在美国无法满足伊朗最大限度的要求时放弃核协议、追求核能力突破的可能。尽管其曾表达伊朗经济自给自足的意见，但仍更倾向争取美国解除制裁。

<https://www.aei.org/articles/us-iran-return-to-nuclear-deal-likely-this-year/>

撰稿人：崔元睿

9、CSIS 发文评析美国在伊拉克的大战略失败

4月1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阿利·伯克战略研究主席安东尼·科德斯曼（Anthony H. Cordesman）撰写的文章《纠正美国在伊拉克大战略失败》。作者称，美国若无法在会议上摒弃过往错误，将难免再度失败，恶化伊拉克分裂的局面并增强伊朗的影响力。导致失败原因如下：（1）从战术而非战略角度思考，忽视长远规划以促进伊拉克统一、发展和国防能力提升；（2）低估伊拉克的战略重要性；（3）关注错误的敌人，未明确意识到伊朗的主要威胁；（4）在驻军和撤军行动上摇摆不定；（5）提供的安全援助不稳定且重点不突出；（6）未能成功维持关键的军事支持、训练和协助力量；（7）未能消除伊拉克国内暴力的源头；（8）未能成功应对伊拉克内政腐败问题；（9）未能提供充足有效的经济援助和经济改革支持；（10）关注狭隘且自私的美国战略伙伴关系而非有意义的地区稳定态势；（11）未能同欧洲盟友在军事安全援助上同欧洲盟友展开合作，依托美国国际开发署而非世界银行进行国际经济援助；（12）未认识到美国实际面临的三重敌人，包括直接对手的威胁，帮扶对象的脆弱、分裂特性及其政府与军队的腐败问题，以及美国对相关国家及任务复杂性的无知。在上述情况下，美国试图通过原有援助方式促进受援国及其文化转型的努力注定失败。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orrecting-americas-grand-strategy-failures-iraq>

撰稿人：崔元睿

撰稿人：崔元睿、许卓凡、王欣然、任怡静、张昭璞

审稿人：王静姝、周武华